论红色文献的含义

李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2
lihuihua0808@ruc.edu.cn

摘要：该文从专门研究红色文献含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入手，着重梳理了中国境内学者对红色文献含义的研究现状及分歧，接着从客体、主体、时间、空间、载体、狭义广义解释、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关系、语种等八个维度的视角，详细分析比较了这些学者在红色文献含义的内涵与外延上的七大分歧，并对广义狭义红色文献做出了新的解释，然后提出了中国红色历史文献和中国红色当代文献这两个新概念，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综合的中国红色文献的新定义。

关键词：红色文献；中国共产党；新中国；　革命文献；红色历史文献；红色当代文献

On the meaning of red literature

Abstract：Starting with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studying the meaning of r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ifferences of researchers in Chinese Mainland on the meaning of red literature.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ven dimensions: object, subject, time, space, carrier, narrow and broad interpretation, and language,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six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meaning of red literature among these researchers were conducted, and new explanations were made for the broad and narrow red literature. Then two new concepts, Chinese red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Chinese re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ere proposed, and a comprehensive new definition of Chinese red literature is given on this basis.

Key word：Red literature；Communist Party of China；New China；University library；Revolutionary literature；official publication

1. 引言：研究红色文献含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红色文献”已成为我国境内的一个热搜词。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典之后，特别是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指出，“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要精心保护好，逐步推进数字化，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之后，其热度就更高了。但是，从研究红色文献的现有成果来看，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图书馆界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对红色文献的理解、定义都各不相同、分歧较大。即当前我国境内学者对红色文献含义的认识，并未达成统一共识。这既不利于对红色文献含义认识的深化，也不利于红色文献实际工作的开展。二是由于红色文献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境内的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包括纪念馆等）、档案馆、各级党史办或史志办等机构，都根据各自对红色文献含义的理解及本单位所藏的红色文献类型和数量，来确定和划分本单位红色文献的收藏、整理、保护范围与标准，导致全国范围内红色文献收藏、分类和保护标准不一、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沟通交流难以衔接协调的困境。这其实也是理论研究困境在现实中的具体反映。为此，有必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红色文献定义。而这当然离不开对红色文献含义的深入研究、探讨和交流。三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篇专门深入分析研究、探讨、界定红色文献含义的长篇论文。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非也。程焕文就曾在《图书馆杂志》2021 年第 7 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的文章。即使如此，但是，该文也只是一篇简单讨论“红色文献”概念的

不足 3 千字的短文。若不能确定红色文献的统一定义，就不能判定哪些文献是红色文献，哪些文献不是红色文献，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红色文献的分类、收藏、整理、保护、研究利用和交流协作等一系列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明确地界定红色文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当前和今后红色文献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红色文献含义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红色文献含义的国内研究综述

2021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的检索界面上，我们以红色文献为全文、主题、关键词、摘要、篇名进行检索，最后得到 67 篇有效文献。其中，24 篇提到了红色文献的含义，占比 35.82%；11 篇专门讨论了红色文献的含义，占 67 篇的 16.42%。2022 年 9 月 28 日，在 CNKI 的检索界面上，我们再次以红色文献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 169（含去年 67 篇）篇有效文献。其中，69 篇提到了红色文献的含义，占 169 篇的 40.83%；38 篇专门讨论了红色文献的含义，占 169 篇的 22.49%。可见，虽然对红色文献含义重要性的认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上，但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还是在不断增多，从一年前的 35.82%增加到 40.83%，提高了 5 个百分点；专门讨论红色文献含义的学者也在增加，从一年前的 16.42%增加到 22.49%，提高了 6 个百分点。而这 38 篇文献，又反映出我国境内学者关于红色文献含义方面的观点并不统一，其分歧主要体现在内涵与外延两大方面，具体又分布在七个层面：

2.1.1 关于红色文献的内容

关于红色文献的内容是只记录中国共产党活动轨迹的信息，还是只记录其他党派活动的信息，或者是两者都记录。对此，一类学者认为，红色文献是只记录中国共产党活动轨迹信息的文献载体，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占绝大多数。但这类观点又有一些具体的差别：以赵莉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主要是记录中共成立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的信息，即“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1]，赞同此观点的有 32 人[2]-[33]；第二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是记录中共成立以来至今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活动的信息，代表人物较多，有范晓丽[34]、傅云霞[35]、黄露[36]、胡松[37]、辛海霞[38]、刘宗凯[39]、刘满平[40]、李光铣[41]等；以程焕文[42]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是记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的信息，宋姬芳[43]等人也持此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是记录五四运动以来至今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活动的信息，其代表人物有刘昱[44]和穆晓艳[45]等人；第五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主要是记录中共成立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活动的信息，其代表人物是刘云开[46]和陈雪[47]等；第六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是记录大革命以来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活动的信息，代表是潘岳风[48]。

另一类学者认为，红色文献不仅记录中共活动的信息，还记录辛亥革命等的信息，其代表有徐雁[49]，朱孔山[50]，王东、孙宗伟[51]，李花蕾[52]，程鑫[5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不仅记录中共活动的信息，还记录新文化运动的信息，代表人物是李朋真[54]。

2.1.2 关于红色文献的出版者、编制者等

关于对红色文献的编制者、出版者、发行者等，是否需要做出特定限制的问题。对此，一类学者认为，需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又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赵莉为代表的 33 人认为，红色文献的编制者、出版者、发行者等，就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政府、军队等；第二种情况认为，红色文献的编制者、出版者、发行者等“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也包括见证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先进分子和人民”，其代表是黄露，

徐雁和程焕文也赞同此看法。另一类学者，即其余近一半学者并未对红色文献的编制者、出版者、发行者等做出特别的限定。

2.1.3 关于红色文献的时间起止范围

红色文献的时间起止上的分歧是最大的，也是学者争论的焦点，这又包括两个时间点的分歧：一是红色文献在开始时间点的分歧。第一、第二和第五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起始时间应该从 1921 年中共成立之时算起，大多数人持此观点；第三、第四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起始时间应该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算起，其代表人物有程焕文、刘昱、穆晓艳等人；而徐雁，朱孔山，王东、孙宗伟、李花蕾和程鑫则认为，红色文献的起始时间可以从 1911 年辛亥革命时算起；李朋真根据国内部分图书馆建设红色文献数据库时的收录情况认为，红色文献的起始时间应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时算起；潘岳风则根据广西鹿寨县的情况认为，红色文献的起始时间应从 1924 年大革命时算起。

二是红色文献在结束时间点的分歧。第一、第三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应该到 1949 年建国时为止，同时，徐雁、朱孔山、王东、李朋真等人也持有这种看法；第二、第四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应该到至今为止，同时，李花蕾和程鑫也持有此种看法；第五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应该到 1978 年为止；第六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应该到 1992 年改革开放时期为止；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应该到 2017 年的 19 大为止。

2.1.4 关于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

关于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是否需要限定的问题。对此，赵莉等人认为，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包括红色苏区、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和中共公开或秘密活动的部分国统区；程焕文认为，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赵莉所说的空间范围，还应包括全部国统区、全部沦陷区和港澳台殖民区；黄露认为，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我国国内，还应包括国外。其余近一半学者并未提到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也就没有对此的限制问题。

2.1.5 关于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

红色文献载体形式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献在载体形式数量上的多寡问题。这其实与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点直接相关，也与文献载体形态出现的时间顺序紧密相连。那些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到 1949 年为止的观点，不可能把 1949 年以后出现的文献载体形态包括在红色文献之内，同理，那些认为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至今为止的观点，也不可能把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仅仅局限在 1949 年以前出现的文献载体类型上。比如，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有“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包括“一切文字记录和图像与录音资料”；第二、第四种观点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包括图书报刊、图片、缩微胶卷、音视频资料、光盘、网络或红色资源数据库等。

二是红色文献在载体形式上是否包括大型物化文献载体如纪念馆、遗址、大型工程等的问题。一类学者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应该包括大型物化文献载体。孔辉、熊传毅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包含“记录……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刘满平认为，“红色文献应该是记录和表现红色文化的一切文献”；范晓丽认为，红色文献是“描述……的一切文献载体”；刘昱、王燕认为，红色文献是“记录……等一切信息的载体”。另一类学者认为，红色文献的载体不应包含大型物化文献载体，绝大多数人持有此看法。

2.1.6 关于红色文献的广义和狭义解释

红色文献在广义和狭义解释上的分歧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关于红色文献在载体形式上的广义与狭义解释。孔辉、熊传毅认为，赵莉关于红色文献含义的定义属于狭义红色文献，他们将广义红色文献界定为“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及壮大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其内容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29]。

另一类是关于红色文献在内容和时间起止范围上的广义与狭义解释。它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刘昱、王燕认为“广义上看，红色文献指五四运动至今，记录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以及壮大历程等一切信息的载体；狭义上看，红色文献专指五四运动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发行或内部编纂的各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的信息资料”[44]。二是刘云开认为，“广义上认为红色经典是指1921-1976年间所创作的，反映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和工农群众生产生活，特别是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成就，至今仍受人民群众喜爱和社会认同的文艺精品；而狭义上的红色经典作品仅指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46]。三是傅云霞认为，“狭义的红色文献一般是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书籍报刊以及标语、印章、文书、证件等文献资料。广义的红色文献主要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因的各种文献资料。”[35]四是程鑫认为，1911年至1949年的书报刊、手稿、笔记等为狭义红色文献，而1949年至今的相关文献资料则为广义红色文献。

2.1.7 关于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的关系

程焕文认为，“虽然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红色文献并不完全等同于革命，但是，红色，象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颜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颜色，早已成为全世界的普遍认知和共识，红色文献也已成为革命文献的普遍形象表述。因此，红色文献亦即革命文献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歧义。”而徐雁认为，革命文献是形成于“中国近、现代特定历史时期……可进一步细分为以时代特征为主的‘革命历史文献’，以地域特征为主的‘革命地方文献’，以在特定政治压迫中遭受禁毁的记录为主的‘革命禁毁文献’等”[55]，并将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直接等同。顾廷龙认为，革命文献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关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与进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出版的书刊资料。”[56]

2.2 红色文献含义的国外研究现状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式微，因而，无人关心红色文献及其含义，只在意红色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朝鲜和古巴正专注于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无暇顾及和研究红色文献的含义；而越南则在效仿和学习中国的红色旅游经验，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红色文献含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对红色文献的关注过于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只是近年来我国兴起的红色旅游热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仅仅是从旅游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红色旅游现象而已。当然，也有人对红色文献的具体内容做过探讨和研究。詹丽雯、蔡婕在“红色文化的国内外文献综述”[57]一文中，提到美国学者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和《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马克思著作中的乌托邦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实践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Maurice Meisner在其书中并未提到红色文献一词，更未提到红色文献含义问题。因此，可以说，国外对红色文献含义方面的研究，是很少的。

3. 认识理解红色文献含义的八个维度

很显然，上述关于红色文献含义的七大分歧分别对应着这里的客体、主体、时间、空间、载体、狭义广义解释、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关系七个维度，再加上语种这个维度，一共是八个维度。那么，从这八个维度的视角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理解红色文献的含义乃至消除其含义上的七大分歧呢？下面我们就来一一辨别和分析比较。

3.1 红色文献的客体维度

红色文献的内容对应红色文献的客体，而红色文献的客体，就是指红色文献的内容和主题是讲什么的、记录什么的。这就涉及到红色文献的含义问题。这里我们从红色文献的字面意思和它在实践中的由来来理解。

3.1.1　红色文献的字面意思

红色文献一词拆开来看，是由“红色”和“文献”两个词组成。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红色”的意思有二：一是红的颜色；二是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58]。在360百科上，红色有三种含义：一是可见光谱中低频末端的颜色，类似于新鲜血液的颜色；二是代表着积极乐观、斗志、豪放和勇气等；三是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共产主义国家用来表示共产主义。[59]而在“辞海”上，红（色）的意思有三：一是本指浅红色，后泛称火、血等的颜色；二是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及政治觉悟；三是表示胜利、成功或喜庆的意思。[60]可见，在对红色的三种解释中，有两种意思是完全重合的：一是红的颜色或鲜血的颜色，寓意着与血有关，或者会有流血；二是象征着政治觉悟高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活动，寓意着有奋斗、有奉献、有牺牲、有流血。

文献一词原出于《论语·八佾》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61]。朱熹在《朱熹·集注》中为孔子所说“文献”一词作注时写道“文，典籍也；献，贤也”。[62]可见，宋代时文献的意思是专指圣人或圣贤的典籍。但到了元代，文献的意思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元代著名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句中“我欲东夷访文献”[63]里的文献，已没有宋代的专指圣贤典籍的意思了，有的只是一般图书资料的意思。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文献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现在的文献，则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64]。

因此，红色文献的字面意思，就可表述为记录有无产阶级革命知识或共产主义运动过程的一切形式的文献载体，包括正式非正式出版物和物化形式的文献等。

3.1.2　红色文献一词的由来

最早出现红色文献一词的国家是苏俄。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领导苏俄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革命史的文献汇编类杂志，如《红色档案》、《无产阶级革命》、《红色年鉴》等。《红色档案》杂志先由俄联邦和苏联中央档案馆出版，后由苏联和俄联邦中央档案局出版，出版时间为1922年至1941年。它主要刊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1918—1920年)、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国家杰出人物的生平与活动等档案文献[65]。当时人们将这些由列宁倡导出版的杂志特别是其中的《红色档案》常常亲切地称为红色文献。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红色文献一词已在苏联流行。

而在我国，红色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1938年。这是一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名为《红色文献》的书籍。[66]其实，该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37年夏，书名是《中国问题指南》。当时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了《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一”第1、2 册)一书，第1册收录了1926 年至1931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9篇，第2册收录了1922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13篇。[67]而在1938年2月，《中国问题指南》一书第1册和第2册合订，由延安解放社以《红色文献》为书名再次刊行。但是，此后并未出版《红色文献》的续篇。建国后虽然对中共党史资料进行过收集整理和研究讨论甚至编辑出版，但并未直接冠以红色文献的称呼，因而也就没有引发红色文献的研究热潮。与此同时，革命文献一词在建国后的图书馆界反而被称呼得异常频繁，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习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红色文献一词才又重新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种习惯才慢慢地被打破。不过，红色文献这一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与无产阶级革命或与中共活动有关，而是因为与拍卖、与收藏界有关。1993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书店首开国内书刊拍卖红色文献的先河，并直接刺激国内红色收藏市场逐步走暖。[68]此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对红色

文献的关注研究热潮。

很显然，红色文献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实践中的由来，都十分明确地表明，它只记录共产党的活动信息：苏联的红色文献只记录苏共（布）的革命斗争和国内建设活动内容的信息，中国的红色文献则只记录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活动内容的信息，并不记录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信息。因此，认为红色文献只记录中共活动轨迹信息的观点，是基本符合红色文献在实践中的演变过程的，而那些认为红色文献还记录辛亥革命时期或新文化运动时期信息的观点，显然与红色文献在苏联和中国实践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不相符。所以，我们认为，记录辛亥革命时期或新文化运动时期信息的文献，是不能入选或不能算作红色文献的。

3.2 红色文献的主体维度

红色文献的主体，就是指红色文献的编制者、出版者、发行者或机构等。以赵莉为代表的 33 人将红色文献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政府、军队等，这个范围太窄；而黄露、徐雁和程焕文等人将红色文献的主体范围作了扩展，认为它不仅包括赵莉限定的范围，还包括国内外先进分子和人民。这个范围还是有点窄，可继续扩展。国内外先进分子和人民只是民间的，还有政府层面的，即国际同盟军苏联；此外，中共的对立方即敌方，这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日本政府与侵华日军等；立场中立的第三方，如美军延安参访团与美国政府等，也应包含在红色文献的主体范围内。因为这些主体出版编制的有关中共活动轨迹客观信息的文献资料，应该也算是红色文献。如苏联/俄罗斯中央档案馆中就有很多记录中共与共产国际来往的书信电报、中共的部分红色档案、中共六大的报告决议等，陈诚档案[69]中就有很多他参与围剿中央苏区时收集的红色档案、红色出版物、红色印制物等，日本外务省和侵华日军也收集了很多有关中共活动信息的红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史，外务省情报部编），美军延安参访团收集了很多有关延安、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印制物、宣传物等红色资料并据此编制了很多上报美国政府的相关材料。所以，我们认为，红色文献的主体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解放区政府、军队，国统区、沦陷区、港澳台地区先进分子和人民，国外友好人士、国际同盟军苏联、立场中立的第三方和立场对立的敌方，如果再延伸一下的话，那就是对红色文献的主体范围不作任何限制，即任何主体出版编制的有关中共活动轨迹客观信息的文献，我们都认为它是红色文献。

3.3 红色文献的时间维度

如前所述，在红色文献含义的讨论中，关于其时间上限和时间下限，即时间起止范围的争论是最多的，也是最频繁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和认识这个问题呢？这里也是从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和时间下限两个层面来理解。

3.3.1 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

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是指红色文献的开始时间点。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关于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有：1911、1915、1919、1921、1924年五种。那么，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最好呢？1911和1915年时，中共还未建立也未进入酝酿成立时期，可以排除该时间点。1924年时，中共已成立3年，这3年的文献不计算在内，显然不合理，也可以排除之。1919年时，中共还未建立，但已进入酝酿成立时期，因为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9、11月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接连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过，若从李大钊思想上正式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角度来看，那么，开始时间点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1918年第3期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70]，这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来了。所以，1918年7月比1919年1月更精准一点。1921年中共成立，若成立前酝酿时期的文献不计算在内，就

给人以突兀的感觉，而且红色文献的完整性就得不到体现。对此，毛泽东主席在1942年写的一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71]而且，我国境内党史专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研究中共党史应从辛亥革命说起。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一些学者认为，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应该从1911年算起。但这与红色文献的客体并不相符。其实，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表明，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至少不能从1921年算起，需要往前推，推到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期。具体来说，就是要从1918年7月开始算起。

从1921年算起不能体现红色文献的完整性，从五四运动即1919年5月算起又不精确，所以，我们认为，红色文献的时间上限应该从1918年7月算起，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事实的。

3.3.2　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

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是指红色文献的结束时间点。目前，我国境内关于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有：到1949、1978、1992、2017年、至今为止。那么，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究竟应该截止到什么时候为好呢？

（1）从理论上看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72]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部分组成，这在当代又被称为红色中国的红色文化。而红色文献又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所以，记录了贯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信息的一切载体，都是红色文献。这就意味着，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不仅跨越了 1949 年和 1978 年，而且还跨越了 1992 年和 2017 年，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这一“伟大实践”并未结束，至今仍在继续延伸。所以，若单从理论上看，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应该是延续至今为好。

（2）从客观实际和中共党史上看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其实，习近平口中的红色资源不仅包括革命时期的红色资源，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资源，是贯穿党的百年历史的红色资源。2021 年 3 月 5 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73]。很明显，习总书记说的红色资源的时间下限早已跨越了 1949 年。事实上，中共建立至今形成的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精神谱系，就贯穿了党的百年历程，且前后连贯、从未中断、一脉相承。我们不能人为割裂历史和文献，更不能说，建国前党的历史形成的文献属于红色文献，而建国后党的历史形成的文献就不算作红色文献。否则，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其实，从本质上看，由中共历史形成的文献都是红色文献，只是前半部分的文献距今年代久远，迫切需要保护，后半部分的文献因距今较近，没有保护的迫切需求罢了。所以，若单从客观实际和中共党史上来看，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也应该是延续至今为好。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客观实际和中共党史上来看，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都应该是延续至今。这里的“至今”是动态的，比如，现在是 2023 年，那么，至今就是到 2023 年为止；10 年后说的“至今”，则是到 2033 年为止。如此顺延即可，这一点必须要说清楚。

3.4 红色文献的空间维度

目前，关于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是否需要限制的问题，我国境内学者对此的看法是对半分：一大半人认为需要对此进行限定：以赵莉为代表的 33 人认为，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应包括根据地和中共活动的部分国统区，程焕文则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黄露又将其扩展到国内外；一小半人并未重视该问题，因为他们在含义中并未提到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对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是不需要进行限制的，但为了更准确高效地收藏、保护、研究利用红色文献，可对其空间范围做出大致的规定，即中国红色文献的空间范围包括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港澳台在内的我国全境和苏联、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因为这五国境内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国内学者所认为的红色文献。

3.5 红色文献的载体维度

目前，我国境内学者在红色文献载体形式上的分歧基本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红色文献载体形式数量上的多少问题，这与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直接相关。由于我们认为，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是到至今为止，所以，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应该包括传统纸质文献和现代数字文献两部分：其中，书籍、报纸、杂志等正式出版物，与档案、文件、相片、地图、会议记录、录音带、录像带、各种宣传制作物、书信电报手稿等非正式出版物，合称为传统纸质文献；而缩微胶卷、光盘、音视频资料、电子版资料、红色门户网站和红色文献资源专题数据库等，则可以称为现代数字文献。

另一个是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是否包括大型物化文献载体如纪念馆、遗址、大型工程等的问题。由于图书馆界文献的主体部分包括由正式出版物与非正式出版物构成的传统纸质文献，和以电子版数据、网络版数据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数字文献（各种数据库）这两部分，再加上大型物化文献载体的难以获得性，鉴于此，我们认为，大型物化文献载体在理论上，可以考虑视为红色文献广义上的载体形式，但在实践中，不宜也不能作为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

3.6 红色文献的狭义广义解释维度

如前所述，我国境内学者对红色文献的狭义广义解释基本上有两类看法：一类是体现在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上的狭义广义解释，另一类则是集中在红色文献的客体和时间维度上的狭义广义解释。根据前面客体维度从字面意思和实践演变过程的分析来看，此处的这两类狭义广义解释的视野还是有点窄。《共产党宣言》于 1848 年 2 月发表至今的 175 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共产党、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形成的大量文献应该算红色文献，特别是在 1921 年 7 月中共成立之前的 73 年时间里有关法国（巴黎公社）、德国（魏玛共和国）和苏俄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的文献更应该算红色文献。因此，我们认为，广义的红色文献是指从 1848 年 2 月至今，世界范围内任何记录共产党活动轨迹或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载体。而狭义的红色文献则是指只记录某国共产党活动轨迹或该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载体。即狭义的红色文献就是国别红色文献，如苏联红色文献、中国红色文献、法国红色文献、德国红色文献等。

3.7 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的关系维度

程焕文在分析二者关系时，事先假定红色文献含义是统一的，也假定革命文献含义是统一的，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都未形成共识。红色文献有八九种定义，革命文献至少也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徐雁的定义，另一种是顾廷龙的定义。因此，在分析比较二者关系时，必须确定红色文献是哪一种定义，革命文献又是哪一种定义，否则，二者的关系是说不清楚的。此处的红色文献显然是指从 1918 年 7 月至今，记录中共活动轨迹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而此处

的革命文献若是徐雁所说的革命历史文献或革命地方文献，那么，革命文献未必是红色文献；此处的革命文献若是革命禁毁文献，那么，革命文献就是红色文献；此处的革命文献若是顾廷龙所说的革命文献，那么，革命文献就是红色文献。

3.8 红色文献的语种维度

上面我们对广义与狭义的红色文献含义做出了新的解释，这同时涉及到红色文献载体的语种问题。所以，从 1848 年 2 月至今，无论以哪国语言或哪种语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马列经典著作、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均可视为广义红色文献；不仅如此，无论用哪国语言或哪种语言记录的某国共产党活动轨迹或该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信息的文献，也可视为狭义红色文献。例如，2012 年 6 月 19 日，在上海最终以 80 万元人民币的拍卖价格成交的 1848 年首版瑞典文《共产党宣言》，就属于广义红色文献。但是，若按我国境内学者的划分标准，它就不是红色文献，因为它既不在 1911 年以后、也不在 1919 年以后、 更不在 1921 年以后才出现的。

4. 红色文献含义的界定

如上所述，我们已从八个维度对红色文献的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比较分析，并对广义狭义的红色文献做出了新的解释。而作为狭义红色文献即国别红色文献之一的中国红色文献，则可从中共党史上的革命和建设两个大的时期来认识，与此对应，中国红色文献就可从中国红色历史文献与中国红色当代文献这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去理解、去划分、去展开。因为中国红色文献记录的首先是1918年7月至今中共活动轨迹的信息，其次才是记录新中国的信息。所以，划分的标准应该是中共党史，而不是新中国史。因此，不能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

4.1 中国红色历史文献的含义

中国红色历史文献是指从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期起，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为止期间，国内外任何记录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领导人民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历史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载体，主要包括传统纸质文献。具体时间为1918年7月到1956年12月，这又包括1918年7月到1949年10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949年11月到1956年12月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民从军事上解放了大西南、大西北和海南岛，并和平解放了新疆和西藏，在各地剿匪、镇压反革命，还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经济上，除西藏外，全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城市则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1954年制定并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所以，到1956年12月底，新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可见，坚持红色文献的时间下限只截止到1949年的各种观点，都可以包含在中国红色历史文献这个概念之中，这类文献特别是1918年7月到1949年10月之间的红色历史文献，因各种原因导致存量少、品相差、研究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大，堪称文物，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好，并做好数字化转化保护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

其具体载体形式主要包括酝酿建党时期出版的马克斯主义文献，建党以来党的领袖的著作、各级党组织的文件、历次会议决议报告、党中央的各类宣言声明，各苏区、根据地、解放区政府或各军区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相册、地图、发布的命令、指示、布告，制作的标语、口号、宣传画报和各种票据（如借粮借据）、证件（如党员证件），当时留存的录音录像带等；国统区、沦陷区与港澳台的各种进步书报刊、相册；苏联留存的中共部分人员档案资料、与共产国际往来的书信电报、中共自身的部分决议与宣言等，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

收集整理、编制出版的有关中共活动的材料、干部培训教材[74]等，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收集编制的关于中共的历史材料、文件等，美军延安参访团收集编制的八路军士气与装备、战况和中共领导人的有关资料等，国外友好人士出版的有关中共活动的书报刊，法、德等国留存的有关中共早期人员的档案资料，建国后至1956年底之前与部分国家建交的相关文献等。

4.2 中国红色当代文献的含义

中国红色当代文献是指从中国正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算起至今，国内外任何记录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民族复兴乃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长期进行的包括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技教育、法制、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全方位在内的大规模国家建设活动的历史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载体。其载体形式主要包括正式出版物与非正式出版物等传统纸质文献、录音带录像带，缩微胶卷、光盘、音视频资料，红色门户网站（中央、省地县党政机关等的官网）、红色文献资源专题数据库等现代数字文献载体。

4.3 中国红色文献的含义

中国红色文献是指从 1918 年 7 月至今，国内外任何记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为实现不同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而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活动、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活动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信息的中外文文献载体。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中国红色历史文献和中国红色当代文献的内容，其载体形式也是这二者载体的综合。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学者在红色文献的含义方面存在着内涵与外延上的七大分歧。

第二，为了更好地认识红色文献的实际由来、更好地理解红色文献的含义，可从红色文献的客体、主体、时间、空间、载体、狭义广义解释、红色文献与革命文献的关系、语种等八个维度的视角，来展开辨别和比较分析。

第三，通过八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红色文献的一个总的定义。

第四，为了更好地弥合乃至消除这些学者在红色文献含义方面的分歧，可从中共党史而不是共和国史角度，将中国红色文献划分为中国红色历史文献和中国红色当代文献两部分。

参考文献：

[1] 赵莉. 红色文献资料综述［J］. 丝绸之路，2009(18) : 31-36.
[2] 蒋娟. 红色文献征集的难点及具体征集办法——以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为例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9）：39 -41.
[3] 孔辉，万彩霞.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搜集工作探析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2（2）：39-41 .
[4] 孔辉，王宗枝. 高校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以遵义师范学院为例 [J]. 图书馆学刊，2015（7）：21-24 .
[5] 蒋娟. 关于红色文献编目工作的几点思考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23）：98-100 .

[6] 孔辉. 红色文献目录搜集浅谈 [J]. 兰台世界，2012（35）：71-72 .
[7] 解荣. 解放前红色文献的创立及其历史意义 [J]. 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15（2）：54 -56, 61.
[8] 彭凤兰. 论红色文献及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以湘西红色文献为例 [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3）：145-146 .
[9] 乔雅俊. 首都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概述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5）：6-8 .
[10] 蒋娟. 图书馆红色文献归于"文物"还是"图书"初探——以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为例 [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16）：154，156.
[11] 彭凤兰，彭一熳. 湘西地区红色文献收集整理现状与对策 [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23)：134-135 .
[12] 贾翠玲. 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收集整理与数字化建设 [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2 -125.
[13] 谭雯，吴青林，谢春鸣.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的社会价值及实现 [J]. 兰台世界，2014（26）：120-121 .
[14] 张慧玲. 基于蜻蜓效应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研究 [J]. 时代金融，2017（12）：286 .
[15] 陈光华，胡耀东. 中小城市高校和地方共同开展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阅读推广创新模式研究 [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38-41.
[16] 贾翠玲. 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与传承 [J]. 图书馆杂志，2022（7）：68-73.
[17] 付勃达. 我国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开发与利用的实证研究 [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2（2）：14-19.
[18] 宋姬芳，朱小梅，王丽丽. 图书馆红色文献利用与研究探析 [J]. 图书馆杂志，2022（2）：71-76.
[19] 郑春荣，邵艳. 融媒体视域下红色文献传播新路向 [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9）：61-66.
[20] 文立辉. 浅析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的分级推广 [J]. 图书馆学刊，2021（10）：11-15.
[21] 王瑶. 论多媒体环境下县（市）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 [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6）：26-28.
[22] 王爽，王卓杰，张丹，李佳. 辽宁省图书馆红色文献工作现状与高质量发展思考 [J]. 图书馆学刊，2021（12）：1-5.
[23] 陈光华. 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阅读推广——以地市级行政区域为区间单元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3）：26-30.
[24] 任静，林卫东，李洪梅. 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研究 [J]. 图书馆界，2021（5）：11-15.
[25] 邓超. 红色文献的时代价值及整理对策分析 [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12）：88-90.
[26] 谷毓. 红色文献的多元价值探析——以《东北画报》为例 [J]. 图书馆学刊，2021（6）：9-15.
[27] 伍涛. 馆藏红色文献赋能场馆爱国主义教育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3）：31-35.
[28] 崔丽娟，宋朋遥，吴秀才. 博物馆馆藏红色文献保护利用研究 [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3）（上）：108-110.
[29] 孔辉，熊传毅. 解析红色文献的内涵及特点——以高校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为研究视角 [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5（4）：140-142 .
[30] 刘竞，王萌，刘桂峰. "文旅融合"视域下红色文献的创新利用——以沂蒙地区红色文献为例 [J]. 图书馆学刊，2021（11）：15-22.
[31] 张玉梅. 宁夏红色文献的价值探析 [J]. 回族研究，2020（2）：34-40 .
[32] 王婵. 中国共产党早期油印红色出版物考述 [J]. 图书馆杂志，2020（7）：13-17， 47 .
[33] 刘禀诚. 红色文献整理素养谈——以《〈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为例 [J]. 红色文化学刊，2020（2）：56-65 .
[34] 范晓丽.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服务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4）：36-40.
[35] 傅云霞.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实践探索——以辽宁省图书馆为例 [J]. 图书馆学刊，2022(8)：9-12.
[36] 黄露. 面向大众的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研究 [J]. 科技与出版，2021（8）：142-149.
[37] 胡松，杨宇光，朱小理. "红色资源"的界定及其转化必然性 [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30（5）：73-76.
[38] 辛海霞. 阅读推广视角的图书馆红色文献开发利用研究 [J]. 图书与情报，2021（3）：19-22.
[39] 刘宗凯.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信息资源阅读推广的现状和对策 [J]. 图书馆研究，2022（2）：63-69.
[40] 刘满平. 数字环境下陕西红色文献资源的收集和利用 [J]. 兰台世界，2014（2）：34-35.
[41] 李光铣. 中央苏区红色档案文献建档保护体系构建浅探 [J]. 兰台内外，2020（2）下：9-11.

[42] 程焕文. 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 [J]. 图书馆杂志，2021（7）：9-10.
[43] 宋姬芳，朱小梅，王丽丽. [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1）：102-107.
[44] 刘昱，王燕. 省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展览现状与思考 [J]. 人文天下，2022（5）：38-42.
[45] 穆晓艳，王颖，蔡庆，香春，何小华.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播实践——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1）：108-114.
[46] 刘云开. 红色经典作品的法律保护：价值、问题与对策 [J]. 图书馆杂志，2021（7）：48-53.
[47] 陈雪，庄革发. 图书馆红色文献传播路径实践研究——以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J]. 图书情报导刊，2022（2）：15-18.
[48] 潘岳风. 传承红色文献 赓续红色传统——以广西鹿寨县红色文献传承与活化实践为例 [J]. 图书馆学刊，2021（11）：23-29.
[49] 徐雁. “进步书刊”“革命史料”与“革命历史文献”——兼述上海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特藏”的前世与今生 [J]. 图书馆杂志，2021（7）：18-24.
[50] 朱孔山. 沂蒙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开发 [J]. 兰台世界，2006（8）：23-24 .
[51] 王东，孙宗伟. 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建设与服务途径创新研究——以临沂市图书馆为例 [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6）：38-41， 51 .
[52] 李花蕾，孔令云. 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3）：20-25，51..
[53] 程鑫，李红光，陈骊骊. 红色文献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实现路径探讨——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为视角 [J]. 思想教育研究，2023（1）：139-143
[54] 李朋真，严丹，蔡迎春. 红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2(1)：29-36.
[55] 徐雁. 重视“革命禁毁文献” 拓展现代文献学研究 [J]. 图书馆杂志，2021（7）：15-16.
[56] 顾廷龙. 顾廷龙文集 [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591-592.
[57] 詹丽雯，蔡婕. 红色文化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J]. 文艺生活，2020（7）：178-179 .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Z]. 第一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 464 页 .
[59] 360 百科. 红色的含义 [OL]，https://baike.so.com/doc/2129797-2253396.html
[60]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 [Z]. 上海：1990，第 1292 页 .
[61] 孔子. 论语 [M]. 湖北：崇文书局，2012 年，第 63 页.
[62] 朱熹. 朱子语类 [M]. 湖北：崇文书局，2018 年，第 54 页.
[63] 杨维桢. 东维子文集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第 25 页.
[64] 曾健民主编. 信息检索技术实用教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 5 页 .
[65] 赵永华. 苏联的历史文献类杂志《红色档案》[J].新闻界，2013（11）：77-78.
[66] 佚名. 红色文献 [M]. 延安：解放社，1938.
[67] 石川祯浩著，李晓倩编译. 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的进程（1929-1955）[J].中共党史研究，2017（6）：120-126 .
[68] 吴伟忠. 漫话红色文献收藏 [J]. 金融博览，2013（11）：74-76 .
[69] 孙翠玲，屈凯. 陈诚收集的江西苏区红色文献概述 [J]. 图书馆建设，2012（10）：28-31.
[70]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第 6 页.
[71] 毛泽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 3 月 30 日）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0-407 页.
[7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0 月，第 41 页。
[73] 新华社.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B/OL]. [2021-12-25]
[74] 延混. 国民党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3）：73-74.